

歷
史
與
空
間

醉翁亭前憶前賢

馬承鈞

中秋前夕，筆者再次親臨「皖東第一名山」之琅琊山，登上名滿天下的中華四大名亭之首的醉翁亭，凝視亭前「飲既不多緣何能醉，年猶未邁奚自稱翁」的名聯，備添「山不在高，有仙則靈」的感慨！

歐陽修（1007~1072）乃江西吉州永豐（今吉安市永豐縣）人，其出身貧寒，四歲喪父，自幼聰慧超群讀書刻苦，23歲考取進士後踏入仕途，官至參知政事（相當於副宰相）。作為北宋著名政治家，他勤政廉政、聲望顯赫，世稱「歐陽文忠公」；作為著名文學家，他引領北宋詩文改革、開創一代文壇新風，與韓愈、柳宗元、蘇軾享譽「千古文章四大家」，與韓愈、柳宗元、蘇軾、蘇洵、蘇轍、王安石、曾鞏合稱「唐宋散文八大家」。

有道是人如其文、文如其人，歐陽修的人格與其文一樣，閃耀著真善美的光芒，不像某些「大師」，人品與文品背道而馳，正如曾鞏稱頌其「道德文章數百年一遇」。

我們撇開歐陽修在文學史上的領袖地位不表，單說他在政治和做人為官上的表現，在今天依然不失表率作用，值得後人見賢思齊。

為官正直講規矩，是歐陽修一大亮點。從宋真宗趙恒天聖八年（1030年）考取進士步入政壇算起，他先後出任翰林學士、樞密副使、參知政事等要職，不管春風得意位居高位，或仕途遇挫受害遭貶，他都能秉公執法堅守底線，猶如青松昂立不畏風雪。

宋仁宗趙禎嘉祐二年科考時，歐陽修是主考官，他堅決抵禦文壇歪風，確保了一批優秀才俊脫穎而出。以劉幾為代表的「太學體」人物文風艱澀怪誕，卻狂傲自大，自詡「國學第一人」。歐陽修不為所動，將劉幾那些人不予錄用，只錄取有真才實用的莘莘學子。

張榜後劉幾等聚眾鬧事，還貼出祭文羞辱歐陽修，朝中一些遺老遺少也紛紛發難。歐陽修卻堅持已見毫不退讓，終於將宋朝文化撥亂反正，也為國家選出一批棟樑之材，錄取者中有八人當上宰相，被稱為「天下第一榜」，其中還包括程顥、張載、蘇軾、蘇轍、曾鞏等一批文化大家。論成績，本來蘇軾應是第一名，因歐陽修誤將其試卷當成自己弟子曾鞏的，便放在了第二。由此亦可見歐陽修的胸襟坦蕩，此事也成為科舉史上一段美談。反觀當今官場沽名釣譽爭權奪利的歪風邪氣，和周永康、徐才厚等賣官鬻爵的醜行，歐陽修的作為尤其令人敬重。

爭權於朝、爭利於市是封建官僚制度的產物，歐陽修卻反其道而行之，面對幾次越級提拔的「良機」，他一再推讓不受。范仲淹當陝西經略安撫招討時，欲請歐陽修出任掌書記，他卻說雖然不少俊傑已為你所用，仍有不少草根英才尚在民間，應多考慮他們才是，讓范仲淹大為感動。仁宗嘉祐二年歐陽修任翰林學士時，皇上想讓他兼任侍讀學士，天子賜封的這一「肥差」他也堅辭了。對那些靠歪門邪道謀取官帽的，歐陽修恨之入骨。仁宗慶曆四年，一些地方官員為獻媚皇上，大搞獻「瑞草」、「瑞木」鬧劇，甚至胡說「瑞字彰顯國泰民安」。歐陽修忿然上奏仁宗說，如今內憂外患，百姓困弊，何來太平

盛世，實乃一派胡言，他要皇上「昭示天下，不得爭相仿效，進獻妖妄」。在君臨天下、唯我獨尊的封建王朝，竟敢對皇上喊出如此尖銳真實話語，不怕落得「誣議大好形勢、影射朝廷昏庸」的罪名，如此大義凜然的敢言直諫，需要何等的氣魄、膽量和擔當！

面對官場險惡和命運沉浮，歐陽修始終保持一種淡泊的平常心，這也是最可貴的。仁宗嘉祐三年（1058年），范仲淹因在「百官圖」上揭露宰相呂夷簡營私舞弊、任人唯親惡行，建議仁宗選賢任能擯棄小人，反被呂夷簡一夥誣以「越職言事，離間君臣，薦引朋黨」的罪名貶出京城，與范仲淹交往的一批忠臣也相繼被貶。朝中還刮起一股「治朋黨」的妖風。一些高官明知范仲淹冤屈，懾於呂的權勢而不敢聲張。右司諫高若納身為諫官不為范仲淹辯護，反嘲諷范「罪有應得」。歐陽修氣得拍案而起，揮筆寫下著名的《予高司諫書》，高度讚賞范仲淹忠心報國，痛斥高若納潰職，文中他大呼：「你高若納如認為范仲淹當逐，我所言也是朋邪之人，你可拿此書去告發我，使正予罪而誅之。」此文一出大快人心，朝野爭相傳聞。高若納果然上奏仁宗，給歐陽修扣上「恣情誦上，顯露朋黨之跡」大帽，皇帝竟也輕信妖言，將歐陽修貶為偏僻的夷陵縣令。

當年韓愈因上《論佛骨表》被唐憲宗貶到嶺南潮州，無奈之下哀嘆嗟怨，寫下《謝上表》自責「狂妄贍愚，不識禮度」；歐陽修面對貶職卻無怨無悔，還向朝中不憂國家、荒淫無恥的權貴們寫出檄文，說「在位者不肯憂國，又禁使他人不得憂」，其大公無私的氣節實在可敬可歎！連宋英宗趙曙都說：「歐陽修性直，不避眾怨。」正由於堅持正義、不懼權勢，歐陽修與呂夷簡結下宿怨，多次被貶出京城。但無論在朝在野，屢挫屢勇的歐陽修都不改初衷，留下親民、愛民、為民的好口碑！

慶曆五年（1045年）歐陽修貶任滁州太守。此地山高水清、民風淳厚，很受歐陽修青睞。他以仁治理，很快政聲顯赫。政事之餘常去郊外琅琊山遊覽美景，暢飲山水之間，在美酒和美景中忘卻了被謗遭貶之辱，也忘了自己的太守身份，這是回歸自然的瀟灑與質樸。正如他在《醉翁亭記》中所云：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間也。山水之樂，得之心而寓之酒也……」沒有一顆寧靜致遠、能上能下的平常心，是絕難有這種感受的！正是：

琅琊山下憶前賢，
秋風習習吻林泉。
世間多少功利客，
何如醉翁一名篇！



■名滿天下的醉翁亭是中華四大名亭之首。

網絡圖片

■曾子游

廣州白雲山蒲澗濂泉探幽懷古

菖蒲九節一寸功，
濂泉一澗九條龍。
不行深處不知水，
一攬九天雲雨空。

天涯海角

版圖匡啓不零亂，
國土拓疆古丈量。
孰道陸端無岸角，
天涯走盡海尖芒。

櫻花

雲裡千堆看粉顏，
花香枝態搖風謙。
衣裳錦繡春裁起，
四月嬌滴十八鮮。

■青 絲

清補涼

午後的街頭，悠悠傳來一陣清補涼的叫賣聲，正在樹蔭下等客的摩的司機，路上走得焦渴的行人，紛紛趨前捧場。性子急的人，捧着碗，不用調羹，就先喝下了大半碗糖水，然後再抹一把額頭上油津津的汗珠，才舀了碗裡的食材咀嚼。一碗冰涼沁心的清補涼下肚，原本濕熱潮濕的身心，就漸漸恢復到了原狀。這一幕場景，猶如一段歲月的靜默回放，於現代的建築群落裡，散發出一股農耕時代的古舊韻味。

很多人乍看到「清補涼」這個名字，會覺得很奇怪，以為是中藥舖裡賣的藥劑，很難想到是一道甜品。實際上，清補涼也確實是從中藥方子發展過來的。傳統醫藥有一味「四神湯」，以中藥四臣淮山、芡實、蓮子、茯苓一道煲湯為飲，調養人的生理機能，使氣血順暢，疾病不生。民國美食家唐魯孫在他的書裡敘有四神湯傳播的故事：台灣有一家藥店的老闆原是船員，長年在海上生活，飢一頓飽一頓的，落下了嚴重的胃病，性命危在旦夕。後來有人授他一個方子，每天早晚連着渣子吃一碗「四神湯」調

養，他照做後胃病得以痊癒，遂開中藥舖濟世救人，「四神湯」也得以流傳於世。

嶺南的夏天濕熱蒸鬱，飲食多兼有健脾去濕、滋潤養生的功能，人們在「四神湯」的基礎上又根據各自的膳食配方，增加了枸杞、桂圓、百合、玉竹、紅棗、薏米、黃芪、黨參等多味適於夏季涼補的食材，靈活組合使用。加上嶺南是糖產區，人們性喜甜食，往湯水食材裡加糖，作為消暑解熱的甜品糖水，也是當地特殊的飲食觀念。所以，「清補涼」既是人與食材、環境三方完美結合的展示，同時這一寓醫於食的名字，也對人們的生存焦慮，加以了慰藉。於這種飲食養生的敘事邏輯下，清補涼因地制宜地完成了升級的程序。

各家店舖的清補涼，所用食材不盡相同，但是煲煮的手法及時間掌握，卻很有講究。從碗裡的各種食材是否軟爛如一，就能判斷出是不是一道成功的甜品。譬如蓮子、芡實需要熬煮時間很長，才能獲得軟爛的口感。與之相比，淮山、百合就很容易煮爛。若是沒有先後，同放在一起煲，蓮子、芡實有可能還沒煮開花，淮山和百合就被煮化了。須得巧用材料，花時間

下工夫，清補涼才能黏糯軟和，清甜滋潤。有些甜品店取巧，是把食材先煲成稠糊，再沖兌調好的糖水，以此節省火力和時間。這種清補涼，沒有水米如一的柔膩質感，水是水，渣是渣，懂行的人一入口就能吃出來。

清補涼也不只是煲糖水一種用途，很多人煲雞湯，也是到乾貨行買一小包搭配好的清補涼作為湯底。另外用清補涼煲斑魚，則被視為促進傷口癒合的食療手段。清補涼以其自身的非凡魅力，為市民生活提供了更為多元的結構形態。



■冰涼沁心的清補涼是夏季妙品。 網絡圖片

字
裡
行
間

■黃仲鳴

兩地傾城記

近翻達七百頁的《海上傾城：上海文學與文化的轉異一八九四——一九零八》（作者呂文翠，台北：麥田出版，二零零九年），甚為過癮。書分兩大部分：一、域外行旅與文化他者——洋場才子奇書，二、情感、自我與地景表述之相互生成，剖述了晚清的域外小說，文化傳譯、治遊文學和王韜、韓邦慶等人的文學活動，引證詳盡，誠好書也。

由是我想起，當年上海的文藝活動，對香港影響甚大，反而後來的五四運動，對港來說，只是起了一陣漣漪而已。這書正如封底介紹所云：「唯有正視『晚清前期』上海文壇蓄積的豐沛文化動力與多元共生的契機，釐清近代中國崛起的『海派』文學之來龍去脈，方能於重繪全景後，清晰理解晚清上海文學文化的現代性預兆先聲。」書中提及的王韜，避禍逃居香港，在港的報業、文學活動，不僅影響了香港，更影響了上海，是兩城的文化媒介人。當然，海派文學後來洶湧南進，在香港形成一股浪潮，在新舊交替的時代中，是個特異的風景，王韜是絕對想像不到的。

「海派文學」含義甚廣，另意可含「鴛鴦蝴蝶派」。「鴛鴦派」何時攻進香港？

正如上文所說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，對粵港的影響甚微，從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六年北伐開始前，一班晚清遺老避居香港，倡行復古，反對新文化，是謂之「隱逸派」；可是他們並不隱逸，卻將他們的復古延至下一代。由此可見，在舊學籠罩下，香港市面的出版狀態是怎麼一副面孔。

一九二一年創刊的《文學研究錄》，便是國粹派大本營，主編者為任職於香港郵政局的羅五洲。此位「郵差」神通廣大，竟然拉到內地「鴛鴦派」作家助陣，而這些作家還赫赫有名，是正牌的「鴛鴦派」大將。該刊現仍可見的有第四期至第八期，由這五期的目錄可見，「鴛鴦派」的大將如徐枕亞、王鈍根、許指嚴、周瘦鵑、天虛我生、徐天嘯、李涵秋、胡寄塵、李定夷等題書或執筆；另如黃炎培、鄭孝胥、林琴南、章行嚴、章太炎、呂碧城等都是國學根基極厚而大有名聲之士；至於羅五洲，更是國粹派的死士，力抗白話文。

另有《雙聲》雜誌，主編為香港的黃崑崙和黃天石。周瘦鵑、徐枕亞、許指嚴、徐天嘯、許塵父、吳雙熱、徐卓呆、李涵秋等「鴛鴦派」盤踞其中，卻沒了《小說研究錄》所標榜的國粹，反而，有一些剛由文言解放出來，想帶點西洋味道的「放腳式」白話文。

《文學研究錄》和《雙聲》，是內地「鴛鴦派」的陣地，也是正式進佔了香港的文壇，影響自不少，香港也傾城了。「鴛鴦派」為何這麼吃香呢？內地學者袁良駿說：

「鴛鴦蝴蝶派小說在香港的走紅和負隅頑抗，和它在上海的興起顯然有着同樣的社會背景和文化思潮。作為大英帝國的殖民地，當時的香港雖然在繁華的程度上有遜於『東方的巴黎』上海，但達官貴人、太太、小姐、公子哥兒和小市民層，同樣有着雄厚的勢力。他們的文學取向正是『鴛鴦蝴蝶派』得以繁榮滋長的最好溫床。」

讀《海上傾城》，使我們更明瞭海派文學的形成，和追溯到早期香港文學所受的精闢，值得一看。 作者提供 影響足跡。

亦
有
可
聞

■龔敏迪

施紹莘與徐霞客的追求

徐霞客在遊記中記載了1628年，他與陳繼儒一起去訪了施紹莘建於佘山「極其妖艷」的別墅。作為明末的散曲家，施紹莘的地位在當時並不在徐霞客之下，有意思的是，他們兩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，那就是對於追求的癡迷，只可惜施紹莘年紀輕輕就亡故了。1625年，他在《百花生日記》中記載當時自己為38歲，他還感慨人生七十稱古稀：「而初十年太少，後十年太老，中間止五十年。而坐困於塾師者幾十年，羈縻於病冗者幾十年，幽沉於風雨者幾十年，所存幾何哉？」可是不滿三年，1631年徐霞客與堂兄「復尋其勝，則人亡琴存」，他最多也沒有活滿44歲。然而這並沒有妨礙他的追求，他明明知道自己在佘山的經營，「百歲之後，安知其不為子孫賣，不為勢家奪，不為平地耕，不為虎狼穴，不為兵寇焚，不為樵堅斲？」還是要在山腰的「半間精舍」、山腳的「就麓新居」，美輪美奐地建有春雨堂、霞外亭、三影齋、西清茗寮、窻黛樓、秋水庵、聊復軒、語花軒、研穩閣等不下十餘棟建築，從1616年冬開始，整整花了十年時間。

《徐霞客遊記》在後世產生影響，他傳世的《秋水庵花影集》影響，則更多的是他的那個時代。他在自序說自己：「猶記十六七時，便喜吟詠，而詩餘樂府，於中為尤多，十餘年來，費紙不知幾十萬。」這種愛好與堅持取得的成就，按陳繼儒在《<秋水庵花影集>敘》的說法是書一出，「上至王公名士，下至馬卒牛童，以及雞林象罔之屬，皆咄咄籲駭」，頓時成了暢銷書，聲名遠播北至吉林、南至靖州，連村中小兒讀《大學》，也在空白處抄錄其文。陳繼儒說：「詩人人可學，而詞曲非才子不能，子野（施紹莘）才太俊，情太癡，膽太大，手太辣，腸太柔，心太巧……」

如今，散曲對大多數現代人已經很隔膜，從他的內容上看，則多作哀苦之音，既寄寓了命運多蹇的身世悲

涼，又是明王朝滅亡前夕社會心理、情緒的反映。如《謁金門》：「春欲去，如夢一庭空絮。牆裡鞦韆人笑語，花飛撥亂處。無計可留春住，只有斷腸詩句。萬種消魂多寄與：斜陽天外樹。」傾吐出詞人愁緒萬端，無可奈何的情思，似乎也並沒有太多特別可取的地方。但形式美也是提升人文情趣的重要部分，更重要的是，其背後隱藏的是和徐霞客一樣靈魂的掙扎。所謂：「意所以躬耕末世，視天下如敝屣也，非輕天下也，其視躬耕無異於治天下。」在那個壓抑得令人窒息的明末極端腐朽現實中，他們都要另闢一個獨立於世俗外的嶄新領地。「二十年前一夢空，依稀猶記夢花紅，而今短髮侵尋白，聞語風流落照中」，人的一生中，總得留下些有意義的東西，所以他在《祝如姬詞》中說：「大荒中有修月戶，予便為人間修詞手，不亦可乎？」與其苟苟蠅營被各種勢力裹挾而去，不如「但能痛飲便名士，解得惜花真丈夫」。

《秋水庵花影集》編入了他徵得的不少時人評語，他甚至將自己的《西佘山居記》「刻三石，一沉三影齋池心，一藏散花台下，一沉北山泉底」，目的就是要告訴世人，還有一種比較有意義的不同活法。

自從施紹莘祖上施退翁任華亭令以來，祖父施大經是萬曆十三年的人，為官剛正，父親施大謙也是舉人，飽受儒家思想浸潤的他們，何嘗不思進入仕途？他似乎也曾有過猶豫，1618年和1621年也曾赴金陵參加科舉考試，但他對朋友說：「子見昔年闈牘乎？如某某者，亦巋然進賢！」哪怕自己「好治經術，工古今文，而旁通星緯輿地」，並且有「鞭羆四方之志」，但哪裡有用武之地？所以人離去了金陵，卻「多作詩詞，絕不了試事」。

轉了一圈，與其說是纖羽而歸，不如說更堅定了「撇卻眼前花，料理千秋業」的決心，更何況「謔浪俱是文章，演唱亦是說法」，他也具備這個條件。